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8期
2007年11月，頁407-426

精確背後的模糊：與彭明輝教授商榷

張力*

一、是量化史學嗎？

自 2000 年起，彭明輝教授獲得行政院國科會的補助，分別以(1)「歷史學研究的動向：以學術期刊為分析對象」、(2)「歷史學研究的量化考察：以歷史學報為分析對象」、(3)「歷史學研究的量化考察：以政府機構與研究機構刊行歷史學相關期刊為分析對象」等三個專題研究計畫，進行 1945 年至 2000 年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趨勢的考察，並據此出版以下 7 篇文章：

代號	篇　名	出版處	頁數
A	〈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量化考察：以五種學術期刊為分析對象，1945-2000〉	《漢學研究通訊》，20:4(2001年11月)	18-26
B	〈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	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台北：麥田，2002年1月	151-205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C	〈從歷史學期刊論文分析臺灣史學研究動向(1945-200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19(2002年5月)	335-363
D	〈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	《漢學研究通訊》，21:2(2002年5月)	1-15
E	〈臺灣地區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以學術期刊與博碩士論文為分析對象(1945-200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20(2003年5月)	375-425
F	〈臺灣地區歷史學報的量化分析(1945-2000)〉	(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21(2004年5月) (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22(2004年11月)	193-234 277-314
G	〈臺灣地區歷史學的研究趨勢：以歷史學期刊為分析對象(1945-200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27(2007年5月)	99-140

說明：為不致佔用太多篇幅，本文以後提及彭教授以上各文，均以代號稱之。

拜讀了這些文章，我的第一個發現是：這 7 篇文章題目竟有 4 篇採用「主題＋副題」，也就是彭教授頗不欣賞且稱之為「雙截棍」的形式，其中題目最長者超過 30 字(連同阿拉伯數字)。第二個發現則是，多篇文章呈現的方式大同小異，全文充斥著數字、圖表，甚至部分內容也在不同文章中重複出現。

再進一步瞭解每篇文章的內容，還可以發現：

(一) B 文原是於 1998 年 12 月 19 日在「四十年來臺灣人文教育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之論文，應是這一系列文章最早發表，後經修訂出版。其所分析者，為 12 所國內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8 篇博碩士論文。

(二) A 文分析者，為刊於《史學集刊》、《史學評論》、《幼獅學誌》、《食貨》月刊、《新史學》等 5 種民間歷史學期刊的 1,717 篇史學論文，分析之後，再與前述之博碩士論文 2,008 篇比較。

(三) C 文是在 A 文所討論的 5 種歷史學期刊之外，另增加《大陸雜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思與言》等 3 種，論文總數由 1,717 篇增加到 5,684 篇。

(四) D 文是以 C 文的 8 種歷史學期刊共 5,685 篇論文(較 C 文增加 1 篇)，與博碩士論文 2,008 篇比較。

(五) E 文分析對象是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較 D 文晚一年出版。文中也提到 D 文的 8 種歷史學期刊論文和博碩士論文的數據，但是歷史學期刊論文總數又回復到 5,684 篇，博碩士論文則增加了 8 篇，總數達 2,016 篇。

(六) F 文分析 20 種大學歷史學報刊出的歷史學論文 2,378 篇，再將各校學報論文數目，分別與 2,016 篇博碩士論文中之各校博碩

士論文數目比較。

(七) G 文所考察者，除了 C 文中的 8 種歷史學期刊 5,688 篇論文(並非 C 文與 E 文的 5,684 篇，亦非 D 文的 5,685 篇)、F 文中的 20 種大學歷史學報 2,378 篇論文，另增加了 14 種屬於研究機構與政府機構的官方期刊 9,624 篇論文，歷史學論文總數達到了 17,690 篇。彭教授除了分析這些論文數目代表的意義外，又將之與博碩士論文 2,016 篇作比較。

這一系列文章是不是量化史學的論文？若依古偉瀛教授的界定：量化史學「簡單說來，就是利用測量計算的方法來研究歷史。」[1]彭教授只有在首次發表的 B 文副題中，用了「計量史學」一詞，其餘各文最多用「量化考察」、「量化分析」、「量化比較」表示，似有意避免其研究被歸類於量化史學。不過，若把 1945-2000 年的歷史學研究成果放在史學史的脈絡之中，彭教授的考察也可算是量化史學的一種。何況，國科會收到這樣的研究計畫申請後，應該是交由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人文學科的歷史學門負責審查，而非自然學科發展處的統計學門審查。

不論是量化史學，抑或只是運用量化來處理史學論文，其實都是採用統計學的方法。我們應該先認識一下甚麼是統計學：

> 所謂統計學，就是針對某一個研究問題，去收集(Collect)所要的資料(Data)，將所收集到的資料加以整理分類並呈現出來(Classify & Present)；而後，進一步將這些整理好的資料加以分析或解釋(Analysis or Interpret)；最後再對這些分析的結果加以推論(Inference)。[2]

依此來看，彭教授針對歷史學研究趨勢的問題，收集博碩士或期刊論文，加以整理分類，用文字和圖表呈現，然後進一步分析或解釋，且亦有些許推論，卻完全未對任何考察之論文所涉及的歷史議題進行討論。因此，將之歸類於統計學的文章，更為恰當。

彭教授採用量化分析，所以文章之中到處可見數字和百分比，且其百分

---

[1] 古偉瀛，〈變中求常，西體中用：淺談史學量化導論的教學〉，收入張哲郎主編，《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1993年6月)，頁138。

[2] 張素梅，《統計學(上)》(台北：三民書局，1997)，頁1。

比的數字到小數點後一位，似力圖顯示其統計的精確。但我以為，這些看似精確的統計數字，都是建築在十分含糊的基礎上。其分析所得的大趨勢，和一般的印象差不多，但是我們若要參考其細部統計結果，就不免令人躊躇再三了。

我對這些文章之母體取樣、分類、數據，及研究動向的解釋，均有不明之處，特藉此文向彭教授請教。

二、關於母體和取樣

先就取樣來說，到目前為止，彭教授取樣的來源有兩種，一是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二是學術期刊。

在博碩士論文方面，彭教授是以 1945-2000 年間所有國內歷史研究所生產的博碩士論文為「母體」。所謂「母體」，是指「具有我們所要研究之某種特性的所有個體的集合(即全集合)」[3]，彭教授對此一「母體」進行「普查」，亦即「對母體的每一個個體加以觀察以取得資料」[4]。彭教授把觀察之「母體」侷限在歷史所的博碩士論文，並無不妥。不過，在 1945-2000 年間，也有不少歷史學研究的博碩士論文，並非出自於歷史研究所，尤其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等所的部份研究生，會從歷史選擇研究議題，例如張世賢的〈晚清治台政策研究(同治 13 年至光緒 21 年)〉，就是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 1976 年的博士論文。[5]

在學術期刊方面，彭教授迄今共選取了 8 種民間歷史學期刊、20 種大學歷史學報，與 14 種官方期刊。這種方式選取的對象，就不能稱為「母體」，而稱為「樣本」。所謂「樣本」，是指「具有我們所要研究之某種特性的部份個體的集合(即副集合)」，若「對母體中的部份個體(即樣本)，加以觀察以取得資

[3] 張素梅，《統計學(上)》，頁2。

[4] 張素梅，《統計學(上)》，頁3。

[5] 臺灣各大學非歷史系所生產的歷史學研究博碩士論文，可以參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4、5、7、23、36各期所刊之學位論文目錄。我因處理這幾期的編務，論文目錄的選取都是我本人的主觀認定，僅供參考而已。

料，叫做抽樣(Sampling)」。[6]彭教授用的就是非機率抽樣(Non-probability Sampling)中的判斷抽樣(Judgement Sampling)。所謂判斷抽樣，是指「抽樣者完全根據自己主觀的判斷而從母體中選出對母體具代表性的樣本。此時樣本對母體之代表性多高，決定抽樣者對母體內之個體之特性的了解有多深。」由此產生「判斷樣本」。統計學者也提醒我們：「判斷樣本很可能可以提供有用的訊息，但由於抽樣偏差，可能因而造成對母體非常不具代表性的問題。」[7]

彭教授曾說明選取期刊的標準，「係以國科會『歷史學期刊排序』所收期刊，稍事增刪。」(G 文頁 101)國科會曾在 1997 年和 2002 年兩度進行「歷史學期刊排序」，若依 2003 年完成的〈第二次「國內歷史學相關期刊排序」計畫〉，期刊共有 37 種，彭教授如何從這 37 種期刊進行篩選？「稍事增刪」的標準為何？在其選取的三種類型期刊中，第一類的「民間歷史學期刊」一共選了 8 種，為何只選取這 8 種期刊，彭教授未做清楚說明，可能是這些期刊刊載的歷史學論文較多之故。第二類是為「各大學歷史學報」，彭教授倒是清楚告訴我們，「主要以該校設有歷史學系或歷史研究所為依據，如設有歷史學系或歷史研究所的大學未出版歷史學報則以該校學報之人文分冊(或文史哲學報)為分析對象。」(F 文【上】頁 195、G 文頁 104)然而如此一來，仍會忽略兩種同屬此類的學報。一是各校歷史系所在未出版學報之前，歷史學研究的論文通常會出現在該校的學報或人文學報上，如《國立政治大學學報》就是一例。甚至歷史系所出版各自的學報之後，學校的學報或人文學報也會刊載歷史學論文，但是這樣的學報就未被彭教授列為討論對象。另一是各校歷史系所學會出版的刊物，這種刊物所刊論文雖然多是研究生或大學部學生的習作，如台大歷史研究所出版的《史原》。但不少現已成為教授的學者，仍會將他們在這些刊物中發表的論文，列在自己的著作目錄中。第三類的「官方期刊」如何選取，彭教授也未說明，以致由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於 1995 年創刊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年刊，就未被選入，有關婦女史研究的統

[6] 張素梅，《統計學(上)》，頁2-3。
[7] 張素梅，《統計學(上)》，頁3、294。

計，自然就會缺少一些。中研院歐美所出版的《歐美研究》(原名《美國研究》)，刊有一些美國史或中美關係史論文，也受到忽略。由國防部支持的《中華軍史學會會刊》(1996 年創刊)、《軍事史評論》(1994 年創刊)，刊載甚多軍事史論文，但這兩份刊物可能沒有參與國科會的歷史學相關期刊排序，自然不在其中。甚至以刊登臺灣史研究為主的《史聯雜誌》(1980 年創刊) 、《高市文獻》(1988 年創刊) ，也被排除在外。

彭教授總計選取了 42 種學術期刊，考察「臺灣地區」的史學研究動向，考察時間起自 1945 年，顯然是以二次大戰結束為起點。42 種期刊之中，有 41 種是在 1949 年以後出版，此時兩岸開始分治，只觀察 1949 年以後臺灣出版之期刊，來瞭解「臺灣地區」的史學發展，有其道理。惟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於 1949 年以前，在大陸已出版至第 19 本。如果 1946 年至 1949 年南京時期的中研院史語所出版的集刊，也能用於觀察「臺灣地區」的史學研究動向，那麼同一時期大陸出版的其他史學期刊，是否也該列入觀察？

總之，歷史學研究所的所有博碩士論文當成一個「母體」，尚言之成理，可以據此進行量化、分析與推論；但期刊就不同了，彭教授掛一漏萬的選取方式，使得其後的量化、分析與推論，都難以令人信服。若再將之與博碩士論文數量比較，就更不可能產生有意義的結果了。

三、關於分類

再就分類來說。以上已發表的 7 篇文章，除了分析對象有異，彭教授的基本模式大致相同，即先看統計的史學論文在 1945-2000 年間的分布情形。彭教授將所有論文依出版或取得學位時間，放在 1945-1960、1961-1970、1971-1980、1981-1990、1991-2000 等 5 期之中，除第一期為 15 年，其餘均為 10 年。接著，彭教授的主要分析項目有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區域」，將其考察的所有論文分成中國史、臺灣史、外國史(或世界史)3 類，有時會多出一類「不明」。第二大類是「本國斷代史」，細分 10 類。第三大類為「專史」，再將論文分成

14 類。這三大類中，各有前述 5 期分別統計的篇數和所佔百分比。

此處的分類，應屬統計學中的「組限」(Class Limit)，亦即所觀察的資料，必須落於組限之中，所以定組限「一定要合乎周延(Inclusive)與互斥(Exclusive)。換句話說，一定要使得每一個個體都能夠而且只能夠落在某一組。」[8]彭教授蒐集到的每篇論文，都可算是他研究臺灣史學史的歷史資料，再用科學方法，進行統計學的分析。研究科學方法應用在史學工作的學者告訴我們：「在我們判斷何種史料可否加以科學分析之前，我們須對歷史資料耐心地加以分析，再者，對歷史資料遽下武斷的科學處理將導致粗劣的簡化，且因其假科學的成份，可能導致比純粹誤解更危險的後果。」[9]張玉法教授討論歷史研究的量化問題時，也指出：「在史料搜集的同時，要把史料化為可以統計的單元，在簡化的過程中最易發生主觀，應加防止。」[10]彭教授憑其主觀認定，依區域、本國斷代史、專史三個大類，再各分成若干小類，統計出不同的數目。主觀進行分類無法避免，但需要告訴讀者，其分類的依據為何，因為讀者也需要判斷彭教授的認定是否有當。[11]以下我就針對三個大類中的分類，提出我的疑問。

我們先看歷史所博碩士論文的區域分類，且以 B 文的 2,008 篇為依據，其篇數分別是中國史 1,466 篇，佔 73.0%，臺灣史 320 篇，佔 15.9%，世界史 222 篇，佔 11.1%。此三種區域分類符合了現今大學歷史系必修課的開課趨勢，中國史、臺灣史分別講授，世界史則略過中國史和臺灣史，且比較偏重西洋史。然而某一區域的授課內容，不免涉及其他區域，但主客之間若能相輔相成，就不成問題。歷史上的臺灣，確有某些時期隸屬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之內，但是論文的主體論述是臺灣，歸類於臺灣史之中，也不致引起爭議，

---

8 張素梅，《統計學(上)》，頁20。

9 G. Barraclough,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Work of Historian” (〈科學方法與史學家的工作〉)，收於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增訂再版)，頁3。

10 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台北：聯經，1978)，頁87。

11 Frederick Floud, *An Introduction to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Historians, Second Edition*(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9), p. 14.

但是論文採跨區域論述，又該如何歸類？舉例來說，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1998 年陳芸娟的碩士論文〈山東流亡學生研究(1945-1962)〉，前半部寫的是山東籍流亡學生在大陸的逃亡經過，後半部則是學生在澎湖、臺灣的遭遇和發展。這篇論文是屬於中國史，還是臺灣史？判定的基礎為何？由於博碩士論文的分類沒有「不明」一欄，且這篇碩士論文不可能歸類於世界史，因此必屬中國史或臺灣史其中之一。

再以歷史學期刊總計 17,690 篇論文的「區域比例」分析。這些論文，依彭教授主觀認定分類，中國史研究佔 81.0%，臺灣史佔 14.4%，世界史佔 4.6%。研究「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的李國祁，曾發表了三篇以「閩浙台」為考察對象的論文。彭教授 F 文和 G 文應已列入了發表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4 期(1976)中的〈閩浙台地區清季民初經濟近代化初探—傳統農商手工業的改進與產銷關係的演變〉一文。[12]這篇論文不知是列入臺灣史，或是中國史？根據 G 文頁 130 統計表(一)，1980 年以前沒有一篇期刊論文被歸類為「不明」，李國祁的這篇論文不可能屬世界史，那麼必定屬於中國史或臺灣史中的一種。那麼，為何會屬於其中的某一種，而一定不屬於另一種，彭教授應有所說明。

其次是「本國斷代史」的大類，彭教授將之分成通史、上古、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近現代、臺灣史、未明確斷代等 10 小類。展開分析之前，彭教授先說明「由於臺灣史研究和中國史研究在臺灣歷史學界被視為本國史，本文的量化乃將臺灣史與中國史一併列入統計」，此外，又在腳註中補充說明：

> 這並不表示我個人贊同這種論述，但為了便於敘述和比較，暫時以一般通行的論述概念進行討論；1990 年代以後，有部分學者主張臺灣史應獨立於中國史之外，我個人亦同意此論點；在論述區域研究時，以

[12] 另兩篇是：〈清末民初閩浙台地區社會觀念與風俗習慣的趨新〉，《陶希聖先生五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食貨，1979)；〈清季民初閩浙臺地區社會結構與價值判斷的變更〉，《教學與研究》，第2期(1980)。

中國史、臺灣史分別統計的方式展現；而在討論本國斷代史時，則將臺灣史列入；因而這兩種方式在本文中分別使用，視計量及比較的需要而定，讀者亦請審慎分辨。

以上兩段引文，同樣出現在 C 文頁 347 註 31、F 文(下)頁 295，和 G 文頁 107。我認為把臺灣史抽離，作一統計，不是問題，過去也有人單獨抽離東北史或西北史的資料目錄輯為一集。[13]但是若要將統計的結果予以精確的量化，先決條件就要先將之作清楚的切割，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出的問題，哪些論文只能歸類於中國史，而不能歸類於臺灣史，反之亦然。

此處需要進一步商榷的是「斷代史分類」的標準，除「未明確斷代」不計外，其餘 9 類其實分屬兩個部份，一是照大學歷史系傳統課程依時間順序的「中國」通史、上古、秦漢、魏晉南北朝、宋遼金元、明清、近現代等 8 類，另一部份只有一類，就是沒有時間斷限的「臺灣」史。顯然在「本國史斷代分期比例」的討論中，原來用在「區域分期比較」的 2,542 篇臺灣史期刊論文，又全數用來和不同時期的中國史論文篇數作比較。所以我認為彭教授無須多費筆墨解釋他把臺灣史列入中國史之中，是多麼地為難，因為他的作法，並未把臺灣史放在中國史之中，至多只是把臺灣史等同一個斷代而已。

全部的臺灣史可視之為通史，如有明確的起迄點，視為一個斷代亦無不可。值得爭議的分類仍是在中國史部份。傳統的課程有明清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兩種，這兩門課原本存在一塊模糊的區域，就是 1840 年至 1911 年的歷史，究竟是清史，還是近代史？一般近代史的內容著重在「西力衝擊，中國肆應」的論述，對於晚清整體的發展，顯然不夠完整；現代史的講授，又偏重晚清的革命運動。那麼在彭教授精確的統計之下，有關 1840 年至 1911 年間中國歷史的論文，何者歸於「明清」，何者歸於「近現代」，我十分好奇。

第三，專史的分類，也充分顯示彭教授是以傳統方式進行主觀的區分，將之分成史學、制度、宗教、社會、思想文化、政治軍事、科技、國際關係、婦

[13] 如趙中孚主編，《近代東北區域研究資料目錄》(台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4)。甘肅省圖書館編，《西北地方文獻索引(1905-1949)》(蘭州：甘肅省圖書館，1986)。

女、教育、經濟、圖書、藝術、未明確分類等 14 類。而我認為，有些論文其實很難作硬性的專史區分，茲舉一例，林美玫在《思與言》第 35 卷第 2 期(1997 年 6 月，「婦女與宗教」專號)刊出的〈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早期在華活動：十九世紀美國「純正婦女意識」的展現〉，其自定的關鍵字，有婦女、宗教二詞，不知彭教授將之歸於專史何類？這篇論文討論的是美國人在中國的活動，我想置於「國際關係」之中，也很適合。而在近代軍事史研究方面，甚多涉及中國購買外國武器裝備的交涉，或聘請洋人來華擔任顧問，這些應該算政治軍事史，還是國際關係史？

四、關於數據

量化旨在取得數據，再藉由數據進行分析。彭教授沒有告訴我們分類的依據為何，使得我們無從驗證，對於各種數據不免存疑。不過，現有之數據仍可找到一二亟待釐清之處。首先是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總數，究竟是 2,008 篇，還是 2,016 篇？總數之差異，是否和彭教授所言「正負誤差率約為 0.04」有關？此一 0.04 誤差率有何意義？歷史學期刊論文也有 5,684 篇、5,685 篇、5,688 篇等三種不同的總數，為何如此？

另一個數據的疑點，恐怕是更嚴肅的問題了。彭教授依其所選期刊，統計出 14,335 篇中國史論文，每篇論文各屬何類，因彭教授並未提供論文詳目，我無法就每篇論文的歸類與之商榷。倒是在 F 文之中，彭教授提及 1999-2000 年出版的《東華人文學報》，由於僅出刊兩期，資料明確，可藉以驗證。

彭教授在 F 文頁 223-224，說明了他對《東華人文學報》刊出之歷史學論文的觀察與分析：

> 本文取樣為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史學院刊行之《東華人文學報》(*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stic Studies*)，刊行時間為 1999-2000，年刊。在蒐集到的5篇論文中，圖2-10-1 “區域比例：東華學報”顯示，中國史研究5篇，占100.0%；臺灣史0篇，占0.0%；世界史0篇，占0.0%。雖然因為取樣母體太少，無法看出東華歷史系教師的研究動向，但從有

限的論著中，猶約略可以嗅出東華學報以中國史為主的取向。當然我們不能如此主觀認定，其未來發展猶待觀察。

出版《東華人文學報》的機構正式名稱為「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並非「人文社會史學院」，想是校對有誤。1999-2000 年出版的兩期，總共刊出 30 篇論文。我把這兩期刊出之全部論文和作者與其所屬校系列出，俾作進一步討論：

《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 (1999年7月出版)

篇　名	作者(所屬校系)
The Crisis of the Literary: Cultural Studies v.s. the Aesthetic	Hazard Adams(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海內文章落布衣：談日本江戶時代的文人	鄭清茂(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詩與抵抗	王靖獻(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	顏崑陽(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An Allegory on Allegory: Reading “Ju song” as Qu Yuan’s *Ars Poetica*一首自我指涉的寓言詩： 將〈橘頌〉讀作屈原的詩藝宣言	曾珍珍(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	王文進(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百回本《西遊記》之唐僧「十世修行」說考論	謝明勳(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二愚之際： 朱熹注《論語》「甯武子」章意涵再探	吳冠宏(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An Iconic Quality in Verbal Patterning	曾銘裕(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論中國韻文學格律的發展	許子漢(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論鄭玄對《禮記・月令》的考辯	車行健(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從道德主體的興發論孔子的文學批評理論	蕭義玲(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從儀式到戲劇： 一個以中國民間迎神賽社為例的初步研究	郝譽翔(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Romantic Alienation Reconsided	余君偉(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A Woman Place (1975): A Pioneering Model of Writing Woman’s History	蔡淑芬(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東華人文學報》第2期 (2000年7月出版)

篇　名	作者(所屬校系)
莎士比亞《暴風雨》的外延與內涵	王靖獻(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論宋代「以詩為詞」現象及其在中國文學史論上的意義	顏崑陽(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百回本《西遊記》之「敘事矛盾」：孫悟空到底贏了誰的「瞌睡蟲」	謝明勳(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莊子與郭象「無情說」之比較：以《莊子》「莊惠有情無情之辯」及其郭注為討論核心	吳冠宏(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The Representation of Silence in Text: Examples from Two Selected Koans	曾銘裕(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戲曲「關目」義涵之探討	許子漢(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龔橙的著述與學術	車行健(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李贄「童心說」的再詮釋及其在美學史上的意義	蕭義玲(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世紀末的女性情慾帝國／迷宮／廢墟：從 《迷園》到《北港香爐人人插》	郝譽翔(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Imagination, Subjectivity, and Wallace Stephens's "Supreme Fictions"	傅士珍(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Romantic Egotism: Reception of Wordsworth's Early Poetry, Sensibility, and the Trope of Poetic "Revolution"	余君偉(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Girlhood Modified in "Susan of St. Brides" in Girl Magazine (1954-61)	蔡淑芬(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Castleford Lost Chronicle: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Yorkshire	Robert A. Albano李白(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敖繼公《儀禮集說》駁議鄭注《儀禮》之研究	程克雅(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元明雜劇官吏形象比較	游宗蓉(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彭教授斷定其中有 5 篇為中國史的論文，並指出：「因為取樣母體太少，無法看出東華歷史系教授的研究動向」，此一說明並無意義，因為 30 篇論文的作者，1 篇為美國華盛頓大學英文系教授，20 篇為東華中國語文學系教授，9 篇為東華英美語文學系教師，並無歷史系教師投稿，自然沒有必要去看該系教師的研究動向。況且歷史系教師的研究動向，可以從各人的著作目錄作一觀察。值得深究的是，彭教授如何從這 30 人次的非歷史系教師發表的論文中，斷定 5 篇均屬中國史論文，甚至還能「嗅出東華學報以中國史為主的取向」，且能繼續在「中國斷代史」中分出明清史 60%，通史 20%，上古史 20%，以及在「專史」中分出藝術史 40%，思想文化史 40%，宗教史 20%。我完全不能理解。

我已把全部論文篇名列出，請彭教授按照自訂之分類，告訴我們哪 5 篇是中國史論文？且各屬何種斷代史和專史？在此我要強調，如果數據不確實，恐有違反學術倫理之嫌，讀者也會懷疑 7 篇文章中其他所有數據的真實性。當然，中國語文學系和英美語文學系的教師，也能撰寫歷史議題的論文，那麼，這 30 篇論文涉及西方和日本研究者，為何不能列為「世界史」的範疇？進一步言之，國內各大學出版之中文學報、人文學報，刊載之中文系和外文系老師的論文，彭教授是否也應蒐集分析？

五、關於研究動向的解釋

彭教授辛苦量化、分析之後，是要藉資說明研究動向。彭教授判斷的基礎，通常是用百分比的單獨呈現或或互做比較，再以「當紅」、「紅火高熱」、「最受青睞」、「水漲船高」、「較受青睞」、「穩定成長」、「熱度上升」、「小火微溫」、「不冷不熱」、「氣勢稍挫」、「由強轉弱」、「降溫」、「冷門」等的詞語，來描述他的發現。由於前面指出分類與數據的模糊，這些詞語也就顯得沒有太大意義。且因為彭教授執著於百分比的統計與比較方式，就忽略了其他的面向。即使我勉強同意所有的數據都有效，彭教授的解釋和推論也有一些令人無法滿意之處。

彭教授 7 篇文章的 5 篇，是以觀察的期刊和博碩士論文作比較。彭教授有時說，這種比較可以「觀察兩者間的倚輕倚重，可謂饒富興味」(E 文頁 402)，有時又說「在比較上或許牛頭不對馬嘴……或不失為一尚具參考價值之量化。」(G 文頁 123)我不免懷疑，彭教授的作法，是不是一種寫作的策略運用？撰寫這一篇文章用了一部份期刊論文，來與博碩士論文比較，撰寫下一篇文章時，再加上幾種期刊。由於論文數量增加，所得的百分比也就不同，和博碩士論文比較時，又可大作文章。如 A 文是用 5 種學術期刊和博碩士論文比較；D 文學術期刊增加 3 種，共 8 種來做比較；F 文以 20 種歷史學報來做比較；G 文再以 42 種來做比較。如此每次另選或擴張一些期刊，彷彿又有新的發現，但我讀起來，實在沒有甚麼興味。期刊論文和博碩士論文互相比較，兩者基礎不同，博碩士論文來自「母體」，期刊論文只是「樣本」，比來比去，只能做片面的統計與片面的解讀。

片面解讀也就罷了，彭教授有時還會出現令人發噱的推論。例如，彭教授發現，期刊論文第 5 期(1991-2000)觀察，中國近現代史的國際關係專史論文只有 3 篇，僅佔 1.6%，而本國史的國際關係專史論文有 16 篇，亦僅佔 2.3%。他於是有了以下的感嘆：「不禁想到現實政治的外交困頓，如果學術研究動向是時代現象的局部反映，我們似乎很難不為臺灣未來的外交關係感到悲

觀。」(E 文頁 398)難道彭教授以為，多發表幾篇國際關係史的文章，就能為我們多爭取幾個邦交國，多讓我們加入幾個國際組織嗎？那麼科技史論文更少，又可以做何種解讀？除了期刊論文取樣不足外，彭教授是否瞭解，我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能接觸到 1927 年以後的外交檔案，在缺乏資料的情況下，如何期望學者或學生投入此一領域的研究呢？

一般而言，學術研究有所發現，應在每篇文章的摘要先作提示，以引發讀者閱讀全文的興趣。不過 7 篇文章之中，C、F、G 三文的摘要非常相似，且只像是研究計畫而已。撰寫論文摘要和研究計畫，兩者重點不同，後者是在研究進行之前，說明研究目的、採行方式，及預估可能的發現，前者則是論文的具體而微，重點放在研究發現的簡單陳述。然而彭教授這三篇論文摘要，均未在其研究發現上有所著墨。令我不解的還有，C、F 兩文摘要第一段都指出：「1945-2000 年臺灣地區的歷史學研究，主要內容為何，關注點為何，是許多歷史學工作者關心的課題。1945 年以後臺灣史學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響：一、日治時期的遺風；二、中國大陸的史學傳承；三、西方史學的輸入。」但在 G 文的摘要中，卻變成「1945 年以後臺灣地區史學主要受到五方面影響」，增加了「四、歷史學術社群內部對史學的思考；五、政治、社會等外緣因素對史學動向的影響。」F、G 兩文發表隔了 3 年，3 年之中，彭教授又多了「兩方面」的發現，為何有此發現，內文未曾說明。

六、中國史v.s.臺灣史

研究動向的解釋，最特出者在於中國史和臺灣史的對比。彭教授似乎喜歡把中國史(或中國近現代史)和臺灣史論文在各期百分比的差距，看成一種競賽，以致時有令人無法理解的論斷。

一般印象，過去中國史研究者居多，1980 年代中期開始，臺灣史研究逐漸興盛，且成為顯學。王晴佳認為 1987 年解嚴以後，「臺灣史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臺灣史的興起，成為一門名副其實

的『顯學』。」[14]我懷疑彭教授把這句話解讀成：「1987 年臺灣地區解除戒嚴，為臺灣史研究風起雲湧的重要關鍵」，而且彭教授進一步發現：「在期刊論文所顯示的，恰是一個反背，1981-1990 年之間，反而是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臺灣史比例最低的時期。」所以他認為：「印象式討論與史學量化之間，有時並不能完全畫上等號」(G 文頁 109-110)。因為他發現中國史期刊論文在 1981-1990 年的第 4 期，達到 86.7%，他感覺很奇怪：「第 4 期適逢臺灣地區解除戒嚴，按理中國史研究的比例應往下掉，反而是 5 個分期比例最高的。」(G 文頁 124)我想王晴佳是把 1987 年看成「臺灣史學」的關鍵年代，而不僅僅是「臺灣史」而已。至於彭教授以自己的發現質疑王晴佳，我倒要對之提出我的疑問：解嚴為何要和中國史論文數目的增減有關？按什麼理「應往下掉」？

觀察歷史研究所中國史和臺灣史博碩士論文的競爭，彭教授發現「中國史比例節節降低，第 1 期占 100%，是 5 個分期中最高的，第 5 期占 66.1%，是 5 個分期中比例最低的，兩者差距為 33.9%。依據曲線的走勢，2001 年以後，博、碩士論文的中國史比例有可能更低。」「臺灣史研究幾乎呈等比級數成長，尤其在第 3 期到第 4 期間，由 6.9%成長到 10.9%；第 4 期到第 5 期更由 10.9%成長到 23.2%，成長比例超過 100.0%。」(B 文頁 156-157、D 文頁 5、E 文頁 382、 G 文頁 124-125，均有大同小異的敘述)以致彭教授樂觀地預估：

> 我們看到臺灣史研究隨著時代的腳步節節高升，說明臺灣史研究愈來愈受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青睞……如果博、碩士論文是歷史學研究的風向球，未來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很可能向臺灣史傾斜。春江水暖鴨先知，博、碩士論文似乎已經預告臺灣史研究的春天已經到來。(G 文頁 125)

博碩士論文百分比乍看之下，中國史研究呈下降趨勢，臺灣史研究急遽上升。但是若從下表中每一期的絕對數值來看，中國史在第 1 期雖占 100%，卻只有 19 篇論文，第 5 期占 66.1%，總數達到 673 篇；且 5 期互相比較，論

[14]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台北：麥田，2002)，頁XVI。

文數目持續增加，尤以第 5 期比第 4 期增加 260 篇為最多。

區　域	比例與比較	1945-1960	1961-1970	1971-1981	1981-1990	1991-2000
中國史	佔總數比例	19(100%)	88(93.6%)	279(80.6%)	413(76.6%)	673(66.1%)
	與前一期比較		增加69	增加191	增加134	增加260
臺灣史	佔總數比例	0(0.0%)	3(3.2%)	24(6.9%)	59(10.9%)	235(23.2%)
	與前一期比較		增加3	增加21	增加35	增加176

資料來源：取材自G文頁131。

如把博碩士論文中國近現代史和臺灣史研究成果，以 5 期的絕對數製成下表，我們可以發現，兩個領域也都是逐期增加。因此，絕對數值的比較，也是一種觀察的角度，因為統計所得數據，原本就可提供多方面的解讀。

論文	領　域	1945-1960	1961-1970	1971-1981	1981-1990	1991-2000
博碩士論文	中國近現代史	2	28	113	204	279
	臺灣史	0	3	24	59	235

資料來源：取材自G文頁133。

臺灣投入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學者比其他斷代要多些，其原因為何，彭教授也不厭其煩，在 B 文頁 156-157、C 文頁 348、E 文頁 383、F 文【下】頁 296、G 文頁 109(D 文頁 7 也引述了一小部份)，一再重複告訴我們：

>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之所以獨受青睞，自有其優勢，諸如材料的獲得較易，文獻的閱讀困難度低，內容與研究者所處時代關係較密切等等；在在使近現代史研究受到較多關愛的眼神。加上歷史研究本即有由近及遠之傳統，非僅中國史如此，西方學術界在西洋史與世界史方面的研究亦是如此。上述因素可能都是造成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受歷史學工作者青睞的原因，而臺灣海峽兩岸國家級歷史研究所亦均將近代史自其他各斷代史中獨立出來，另行設立近代史研究所；因此，近現代史在中國史研究中占有高比例的研究人口，實其來有自。

有時彭教授也會為這一段文字加個補充腳註：「這些因素加上歷史學系將中國現代史列為必修科目，大學院校將中國現代史列為必修，專科學校將近代史列為必修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使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熱潮高溫不退。」以上兩段說明可以部份解釋投入人數居多的現象。我認為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之間，以下幾種影響中國近現代史和臺灣史研究發展的因素，特別值得重視：

(一) 如同彭教授所言，大學與專科學校將中國近代史或中國現代史課程列為必修，因此需要補充大量師資。這些教師後來對其指導學生的選題，應有若干影響。等到中國近現代史改為選修課程，甚至取消，而臺灣史課程逐漸增加，就業機會也就產生變化。

(二) 亦如彭教授所言，材料獲得較易。其原因在於史料的開放與大量出版，如文海書局出版的大批《中國近代史料叢刊》、中研院近史所不僅開放清末民初外交檔案，也刊印若干專題史料，中國國民黨陸續出版的《革命文獻》、《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都很容易滿足學者和學生的研究需求，其研究能早見成果。後來有一段時間，政府和國民黨檔案的開放少有突破，研究者尋求新議題的努力屢屢受挫，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無可避免的陷入瓶頸。

(三) 教育部在 1980 年代專門設置中國現代史獎學金，吸引一些研究生投入研究。此一獎學金取消後，誘因也就消失。

(四) 我們若從時間點來看，臺灣是在 1987 年 7 月 14 日解嚴，到 1990 年底只不過三年多。這三年多時間，臺灣史的研究應該正在逐漸加溫，學者在推動臺灣史研究時，也是從調查史料、整理史料著手，或將之編輯出版，或提供方便調閱的管道，其成果應開始在 1980 年代末才陸續出現，且在 1990 年代大幅增加。而中國史研究在這一段時間仍然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亦有成長空間。

(五) 解嚴對臺灣史研究有提升作用，也同樣給予中國史研究更廣闊的空間，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熟悉中國近現代領域的人應該瞭解，臺灣長久以來是在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史觀」引導下，進行歷史教學與研究，因而某些歷史議題的研究會特別強調，但另一些議題就未受到鼓勵。解嚴前後，臺灣的政府檔案因蔣經國指示移往國史館，雖然數量仍屬有限，卻也為民國史研究提供了相當多的史料。新議題的開發和新史料的湧現，應最能吸引研究生，可能和中國近現代史博碩士論文數目仍然持續增加有關。

至於期刊，由於並未採取完整的母體觀察，彭教授雖然以甚多篇幅進行分析，提出解釋，我對期刊統計的數據仍不放心，因此無須再做討論。不過有個情況或可提請彭教授參考，大約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前，期刊因缺乏評比機制，其重要性不如今日，而各種學術會議習慣在會後出版論文集，許多論文就被論文集吸納了，投到期刊的論文稿件必然減少。

利用粗糙的量化統計來把臺灣史和中國史近年來的發展，看成相互爭勝，並沒有意義。臺灣藏有大批 1949 年以前的政府檔案，目前方便使用的只有少

部份，若是申請調閱合情合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仍有開創空間。然而目前甚多政府機構仍在「機關檔案」的定義下，處理申請借閱事宜，中間確有甚多不便之處，令研究者頗感氣餒。今年外交部同意交由中研院近史所代管大批檔案，使其所謂的「機關檔案」可以依學術機構的管理方式，迅速提供服務，吸引許多學者學生蒐集研究資料，未來應會陸續出現外交史，甚至其他領域的多篇論文或專著。而我更好奇的是，應用這批從 1940 年代後期到 1980 年代，在中國國民黨執政下的外交檔案，所得出的研究成果，究竟該被歸類為中國史，還是臺灣史，不知彭教授如何界定？如果 1949 年以後所有政府檔案的記錄，都是臺灣史範疇，那麼隨著檔案的累積與開放，臺灣史的研究成果當然會大幅超前。

中國史也好，臺灣史也好，質的提升遠比量的增加重要。研究中國史或臺灣史的學者，都能使出自臺灣的研究成果，獲得國際學界的肯定，就是最大的貢獻。我們原本就有研究中國史和臺灣史的材料優勢，我們自己不好好把握，其他國家的學者也會重視並充分應用。倒是臺灣的世界史研究成果極為有限，成為臺灣追求國際化的一大諷刺，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世界史研究的語言障礙較大，史料獲得不易，使得世界史研究在臺灣地區難以發展。」(G 文頁 125)彭教授既知有此現象，何不協助謀求改進之道？

七、結語

我以為解決彭教授文章諸多疑點的最好方法，首先得把期刊的「母體」立即擴至「全集合」，不要一次加幾種，這樣才有完整的基礎。其次是要列出所有對之分析的論文，並標示各篇論文分別屬於區域、斷代史、專史中的何類，讀者方能針對彭教授之認定，再做判斷。當然，一般學術期刊不可能給予過多的篇幅，列出成千上萬篇論文目錄，彭教授可以將之公佈在網上，列出網址，讓讀者有機會查詢，更可讓有興趣一探究竟的作者，看看他的論文被歸到哪一類，且是否同意彭教授的主觀認定。

彭教授的量化研究，「並不考慮某篇論文的好壞、貢獻度等問題」，且認

為「用數字說話或許是一種比較客觀的呈現」(D 文頁 2 註 7、E 文頁 380 註 12)。然而這樣以模糊基礎作為量化的研究，有何種意義？觀察出來的結果和我們平常的印象又有多大區別？我再引述古偉瀛教授的一段話：

> 有些量化基本上是對於原來就很明顯的事物或現象重覆，也就是說，有些歷史問題不待勞神費時的量化研究，即可知其結果的，量化不過是多此一舉……若要從事大規模的量化，在動手之前應當三思而行，即是在投入這麼多人力物力之後，其成果是否與成本相應？歷史史料的不全，永遠是史學工作者的傷口。如果空隙太多，掌握的資料代表性不足，即使方法再好，技巧再熟練，所得的結果還是有很大的限度。[15]

拜讀了彭教授這一系列文章，我更是同意古偉瀛教授的看法。

量的多寡只是虛象，嚴肅的學者仍是要多做披沙揀金的工作，對於某個特定議題的研究成果，進行質的分析。亦即蒐集某段期間研究某個歷史議題的重要論文或專書，觀察其成果如何，有無超越前人的發現，甚至和其他國家學者的類似研究做比較，進而指出此一議題未來可能繼續探討的方向。如此紮實的研究回顧，對於後繼的研究者才有幫助。彭教授有自己專精的領域，若能定期就該領域發表的重要著作，作一評介，對學界將會幫助更大。

[15] 古偉瀛，〈歷史量化的反思〉，《新史學》，第2卷第2期(1991.06)，頁120。